

记忆、创伤与殖民经验的再现

——浅论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的被殖民书写*

韓知延**

目 录

1. 引论
2. 《亚细亚的孤儿》：记忆、创伤与殖民经验
 - 1) ‘现代化’与‘日本化’之间：‘迷茫’与‘困惑’中的‘身份认同’之旅
 - 2) ‘殖民现代性’与经验的再现：‘人生挣扎’与‘痛感体验’
3. 小结

1. 引论

在历史和文学的叙述的大条件下，文献中的历史和文本中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与‘勾连’关系。但基于能指和所指的表征体系，文学叙述比历史叙述更加具有多义性和流动性。在某个特定文本中的历史文化经验和记忆，它不断向现实世界转化和泛化的过程，对原有的历史文脉起到一定的拟像作用¹⁾，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²⁾。若从这个角度来关照殖民

* 此论文曾发表于2014年2月20日由韩国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对东亚现代文学的后殖民后现代思考”国际学术会议上，笔者对此文作了进一步地修改和补充。

** 釜山外国语大学中国学部讲师。

1) 参阅黄进兴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2) 根据一些著名符号学家所提出的符号性质和涉及范围颇为广泛。在特定背景之中，每一

语境中的台湾新文学，这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上，或许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知识和启发，也能够提供更多的新视角。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从理论上讲，殖民主义是一部制造出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抽象的机器。在殖民主义表征逻辑之中，构造独立的殖民地他者，分隔同一性与他者性，既是绝对的，彼此间又有着密切联系。³⁾ 当我们意识到殖民话语中所建构的‘他者’形象的内在逻辑和相互作用时，更多显现的是某种文化意义，同时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显像’(manifestation of culture)，使它具有更加明显的‘象征性’和‘符号性’，因此我们从中可以寻找台湾文学研究的切入口。在许多台湾新文学作品的文本中，浮现着明显的、难以磨灭的‘殖民经验’的痕迹，存在着对日本殖民统治‘愤怒’或‘亲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相互交叉和相互矛盾的意识。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既不能偏向于表面的特点，也不能单从时代的角度来阐释。我们之所以要克服殖民话语中的张力，并且谨慎地探讨在文本的殖民叙述背后的多种因素，是因为台湾所经历的殖民是‘多重’的，而不是单向的。日本的殖民政策所带来的大量变异的因素和现代性的冲击，使台湾人面对身份建构的危机的‘心理创伤’(trauma)，以及殖民统治与被同化的精神困境。换言之，所谓的‘殖民性’与‘现代性’在此找到接合点，于是遂有‘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说法出现⁴⁾，这也使台湾社会形成了与其

实体都可以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符号载体，也具有各种符号形成的意义。根据这一点，若从相关的理论脉络切入，把它谨慎地运用到具体文本，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进入文本内部而解读文本的工具和策略。相关内容参见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乌蒙勃托·艾柯著；卢德平译，《符号学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3) 参见[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133页。

4) 1895年后，日本殖民政权为了在台湾进行持续的资本与原料的压榨，有限度地进行资本主义化与现代化的改造工程，例如现代制糖工业与新式教育、卫生改善等，便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性’产物。殖民性与现代性在此找到接合点，于是遂有‘殖民现代性’的说法出现。有限度的进步乃为了更方便殖民者掠夺。因而，挟带着被殖民主义话语所先验地断定为优越的现代性，让本土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殖民性与

它被殖民地区性格迥异的‘殖民经验’(the Taiwanese colonial experience), 以及与众不同的‘情感结构’, 它既有正面的, 也有反面的。具体来说, 由于殖民现代性包含被殖民者的认知层面, 就像鲁迅小说中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一样, 两者间形成了所谓‘观察(看)’与‘被观察(被看)’的二元关系, 这种观察与被观察者作为纯粹对象的情形不同, 如果将殖民社会当作一个巨大的容器, 其中包含着殖民现代性内容的话, 那么被殖民者也同时被放置于这个容器中, 与身边密集散布的殖民现代性因素共存, 经过长期浸淫, 这些因素逐渐大量地附着在他们身上而难以剥离, 因此这种从殖民社会内部由原本具有文化异质性的被殖民者所作的观察, 既与殖民者不同, 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他者’或‘他者困境’不尽相同, 尤其对现代性问题来讲, 呈现出一种各自不同的‘认知逻辑’⁵⁾。就此而言, 值得一提的是, 进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使其在台湾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 这在文学领域中出现了‘皇民文学’。在日益强制化的体制下, 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学立场: 一种是倾向于日本的, 而另一种是倾向于台湾的。虽然用日文进行创作, 但有些台湾作家如张文环、王昶雄、吕赫若、龙瑛宗等人用自己的书写方式, 并以对殖民者保持抵制与批判的态度, 表现出台湾的本土人情, 以及被殖民的台湾和台湾人等, 这既是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特殊之处, 同时也是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上的价值所在。

笔者认为, 以上述论述为切入点, 将它放置到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⁶⁾的具体文本之中, 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重要的解读线索。众所周知, 《亚细亚

现代性的意象叠合在一起, 而可能走向将日本视为进步代表的困境。相关内容参阅须文蔚主编, 《文学@台湾》, 台南: 国立台湾文学馆, 2008年, 第65页。

5) 参见计璧瑞著, 《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135-136页。

6) 《亚细亚的孤儿》可作为吴浊流的成名作, 此书成书于日治时期, 于1943年起稿, 至1945年脱稿, 1946年最先在日本出版, 原名为《胡志明》, 后以《亚细亚的孤儿》(アジアの孤儿)、《被弄歪了的岛》(歪められた島)等书名在日本再版。后被译成中文, 以《孤帆》、《孤帆小影》、《亚细亚的孤儿》等为书名在台湾发行。除此之外, 于2012年至今, 此书被译成韩文并正式出版。

的孤儿》曾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从文本外在特征来讲，作者虽然是用日文写的，但考虑到作品的艺术形式，仍然是采用民族传统文学的结构方式和表现手法，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而从文本的内在机制来讲，作者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殖民语境下，通过知识分子胡太明的心路历程和一些事件，以及殖民时期台湾人民的不幸遭遇，在文本中既展现了难以排泄、难以摆脱的种种‘苦闷’，难以度过的‘迷茫’，以及作为被殖民者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反映出人物在殖民/被殖民的对立状态中的生存困境，由此揭示了难以澄清的身份认同危机等诸如此类的关键性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以往的大多数评论几乎都肯定这部小说的成就和意义，如有些评论认为这部小说是不落俗套、不落窠臼的一部雄壮的叙事诗。这部小说不但写尽了台湾社会的‘诸样相’，道出了台湾人的悲观离合、迂回曲折的‘命运’。有瑰丽的乡土色彩，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台湾人的‘意愿’、应走的路及未来的命运，因此可以说《亚细亚的孤儿》的文本指向性十分明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据此，笔者拟将从台湾的‘殖民经验’入手，试图解读《亚细亚的孤儿》在个人内部的挣扎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特殊的内涵的。

2. 《亚细亚的孤儿》：记忆、创伤与殖民经验

谈起台湾新文学，与记忆、创伤与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还可以说，殖民地台湾新文学围绕着上述所说的这些因素来展开，这取决于作者的各种不同处境和立场（如身份、种族、阶级、性别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它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物、景观、事件，如何透过文字书写或其他媒体方式来保存记忆与经验，以及如何弥合所谓的心理创伤。不同的再现方式，决定不同的历史记忆，也决定不同的再现方式。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

7) 参阅陈芳明著，《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第

文学书写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有助于呈现出具有独特意义的文本价值。

1) ‘现代化’与‘日本化’之间：‘迷茫’与‘困惑’中的‘身份认同’之旅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的落后性便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殖民论述经过强化、提升、复制和传播之后，一般台湾人在文化身份认同建构的问题上不免会产生动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具体文学文本，主人公胡太明正是一名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里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亚细亚的孤儿》中，我们不难发现，回眸胡太明的人生路程，正如作者吴浊流在《自序》中所说的‘被扭曲的历史’一样苦闷，沦落为这种历史下的牺牲者。从他的家乡‘台湾’移动到‘日本’、‘大陆’，随后重新回到‘台湾’的空间转移中，所谓‘台湾人’的身份，由空间转移来决定，这一点让胡太明身处精神危机之境，遭遇不平等的待遇和心理尴尬。在这部作品中，胡太明共有五种‘身份’：即‘在台湾的台湾人’、‘在日本的台湾人’、‘在中国的台湾人’、‘在中国的日本人’和‘在中国的中国人’。对这五种身份，胡太明有的认同，有的则不认同。作为‘在台湾的台湾人’，胡太明在工作、爱情上都受到歧视，在皇民化时期过着悲惨的生活，甚至被强征去大陆做日本人；作为‘在日本的台湾人’，虽然不像在台湾受日本人的歧视，但在留学生聚会中被部分大陆学生怀疑为间谍，使他第一次感到政治的复杂；作为‘在中国的台湾人’，虽然受到大陆学生的爱戴、大陆朋友的信任，但终究挡不住政治的浪潮而沦为阶下囚；‘在中国的日本人’是胡太明完全不认同的身份，在广州面对敌视他的同胞及慷慨就义的抗日青年，让他精神崩溃。最后经过长期的挣扎反省，为了寻找‘没有矛盾’的生活，胡太明终于认识到在这一时期的台湾人惟有选择做‘在中国的中国人’，才能克服‘孤儿’的‘处境’⁸⁾。由此，我们

223页。

的思考和探索的出发点是，台湾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为什么被选择‘被扭曲的’历史地位呢？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妨引用作者的一段话，吴浊流曾经这样描述过：

“《亚细亚的孤儿》是透过他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泥污渣滓，一一揭露出来了。登场的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问日、台人、中国人的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不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⁹⁾

正如作者所说的一样，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从胡太明不断追求民族解放和身份认同的痛苦经历的一切不只是胡太明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在特定的殖民历史时期中所谓知识分子的‘迷茫’和‘困惑’。

因此，所谓‘孤儿’的现实‘处境’或者‘孤儿意识’是日本殖民时期所留下来的、‘殖民现代性’的特殊产物，这就意味着台湾殖民现代性和台湾人的独特的殖民经验与具有类似殖民经验的其他国家或群体之间最大的区别，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台湾的特殊性在于被殖民者的台湾和殖民宗主国日本之间还有一个‘中国大陆’这一祖国概念的存在接入而发生的。从而可以判断台湾的特殊性显得尤为突出。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处于一个特殊时期的台湾人来讲，所谓的‘殖民创伤’可归结为‘孤儿意识’，它实质上深深反映了对‘身份’与‘认同’的焦虑和危机感，因为对‘身份’和‘认同’的文化意义上的这一看法，就殖民台湾的历史脉络而言，在‘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日本化’（Japanization）这两组特殊的概念之间，往往会发生严重的混淆，这些问题，并不是所谓殖民地知识分子能够分辨清楚的。¹⁰⁾ 因此，在殖民

8) 参见陈昭瑛著，《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

9) 吴浊流著，《亚细亚的孤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35-236页。

10) 参阅陈芳明著，《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第54页。

语境中出现‘文化身份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的现代问题, 其混淆现象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之间蔓延开来, 在《亚细亚的孤儿》中, 这种现象显得十分明显:

“历史的动力会把所有的一切卷入它的漩涡中去的。”某日晚上, 幽香的姐夫半带戏谑地揶揄道, “你一个人袖手旁观恐怕很无聊吧? 我很同情你, 对于历史的动向, 任何一方面你都无以为力, 纵使你抱着某种信念, 愿意为某方面尽点力量, 但是别人却不一定信任你, 甚至还会怀疑你是间谍, 这样看起来, 你真是个孤儿。”¹¹⁾

胡太明无论到哪里都是孤独的, 也得不到任何承认和精神寄托。为了逃避殖民者歧视台胞的现实矛盾, 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去日本留学, 但在留日时期, 因为自己是‘台湾人’而被中国学生‘排斥’, 在南京因为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台湾人’, 并且毫无虚饰地吐露自己对于中国建设的真情而受当地警员的审问, 被羁押间谍。显然, 在文本中所描写的‘孤儿’等同于对自我的‘认同危机’, 这种‘孤儿’的阴影和心理‘危机’始终跟随着胡太明, 他始终在自我斗争的过程中, 在逃避和寻找的两种不同途径中, 胡太明的一生都没有正确的方向, 他内心中的极为空虚和寂寞, 让他感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幻灭, 也经受了巨大的内心打击:

“我们(台湾人)无论到什么地方, 别人都不会信任我们。”“命中注定我们是畸形儿, 我们自身并没有什么罪恶, 却要遭受到这种待遇是不公平的。可是还有什么办法? 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天生的‘庶子’, 我们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 并不落后人。”¹²⁾

台湾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的洪流里, 只能成为一个特定的人群。由于这样的特殊性, 他们既被大陆人怀疑, 又被日本人监视着, 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11) 吴浊流著, 《亚细亚的孤儿》, 第148页。

12) 同上, 第97-98页。

貌似一切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因此使他们逐渐增加所谓‘孤儿意识’。在广阔的文化意义上的孤儿意识，无疑是当时的殖民地台湾社会的客观存在，也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体现出台湾人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由此可见，所谓的‘孤儿意识’来源于被‘歪曲了的历史’，从台湾的特殊经验中牵涉到一种大命题，据吴浊流所言：“台湾人在无意识中，认为台湾是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我们做子孙的，有保护它的义务。我们的祖先，经过无数的艰难辛苦与努力建设起来的村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祖先流下的汗、血与泪。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决不是清朝。……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¹³⁾，可见从这个命题中蕴含着作者的内在机制——即如何寻找一个能够使台湾人正视自己、消除多重身份的隔阂，以及克服身份困惑的途径。在《亚细亚的孤儿》中有下面一段话正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意识：

空虚的理论现在绝对行不通了，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救中国。希望你赶快从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选择一条自己应走的路，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与你自己命运有关系的问题！¹⁴⁾

战时体制的展开更加剧了台湾人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感到‘迷茫’和‘困惑’，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祖国，只能存在于个人‘记忆’和‘想象’之中，故土难归的磨难和忧伤；因为所谓民族国家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¹⁵⁾。在《亚细亚的孤儿》这一书中，胡太明永远都无法放弃自己的‘根’，在迷茫与困惑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身份，抱着伤痕累累的‘殖民记忆’来‘想象’和‘构造’祖国大陆，从而想得到‘自我存在’的确证。

13) 吴浊流著，《无花果》，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第38-40页。

14) 同上，第138页。

15) 参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

《亚细亚的孤儿》鲜明地揭示了被殖民的‘现代化’和‘日本化’经验的双重纠结，以及在历史影响和殖民社会文化中所造成的种种冲突之间，台湾人对自我身份的思考与探求中所引发的所谓身份认同问题和基本的自我缺陷之中的内外部因素。吴浊流书中的主人公并不是在预先选定的历史路程中在中国台湾日本三角间移动，而被殖民情境的不正义与压迫所驱使，这三角关系是受限且闭锁的。所谓‘孤儿’的概念正是源于不可能属于一个构成现代/殖民世界系统的‘民族家庭’。这也是一个‘殖民的寓言’，出现在了不同压迫的结构中，即日本殖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中，对所在场所的意识。这不是一个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目的论展开的胜利的实现，或是伪装的日本对西方的相对化；这是一个在殖民系统中救赎不可能性的‘心理创伤’的实现。¹⁶⁾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所谓‘身份认同’这一问题，对于台湾社会和殖民地台湾新文学文本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既具有抗拒被民族同化的象征性，也具有寻找台湾人‘自我身份认同’建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正因如此，台湾新文学中所体现出的这种经验既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抗日文学，也不同于东北流亡作家的抗日文学¹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亚细亚的孤儿》仍然具有耐人寻味的解读价值。

2) ‘殖民现代性’与经验的再现：‘人生挣扎’与‘痛感体验’

当我们解读台湾新文学文本时，‘殖民性’与‘现代性’的两种特点可以成为一个进入文本的切入点，殖民现代性可谓是现代性进入殖民社会引发的多

16) 关于《亚细亚的孤儿》的读法，值得参考的是，把《亚细亚的孤儿》被读成反欧洲中心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这部作品中空间的连结对理解晚期资本主义中中国台湾与日本间关系具有关键作用，于是提供了一个从殖民地台湾出发对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殖民主义的反叙述。参见荆子馨：〈现代性/殖民性中的台湾：亚细亚的孤儿及殖民差异〉。收陈芳明主编，《台湾文学的东亚思考：台湾文学艺术与东亚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建会，2007年，第360-373页。

17) 参阅卞新年编，《文学史视阈的转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5页。

重变貌和矛盾纠葛，也是殖民统治的突出特点。就这一点而言，殖民统治所引发的‘情感’体验，即‘痛感’和‘快感’体验，这无疑是在被殖民者的经历中所建构的。虽然在文学文本中有着较为清晰的表述，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些‘含混’、‘中性’的情感表现，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情感的影响确实存在，殖民时期的各类文学文本，包括传记、杂感等无不是情感记忆的一种‘写照’，这些记忆很可能决定了被殖民者的思考方向 and 选择。¹⁸⁾

其实，情感结构与主导社会特征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它是对现实的‘真实体悟’¹⁹⁾。通过以‘情感’体验引发的相关线索为参照，笔者也认为，对解读具体文本中挖掘情感结构的阐释有所启发。因为从情感的角度看，它也可能是作者情感经验的表达，那种‘悲愤’、‘无奈’、‘绝望’等多种心态无疑是当时普遍社会心理的写照。文本写作的多重想象也是情感经验随殖民社会演进从相对单一过渡到复杂的产物，随着殖民同化的深入和殖民暴力形式的改变，被殖民者对殖民统治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改变。可见，在文本写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因素无疑是殖民统治引发的，具体而言，就是在以中文写作为主的时期，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情感表达，即殖民压迫导致的‘痛感’体验，并延续到部分日文写作中²⁰⁾，所谓痛感体验就是由痛苦经历引发的情绪。那些带有鲜明反抗殖民倾向的文本大都书写了被殖民者的惨痛经历和愤怒、屈辱的情

18) 参见计璧瑞，《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华文文学》（第5期），汕头大学，2010年。

19) 参见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第5期），北京外国语大学，2002年。

20) 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者对‘文化想象’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这不同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文学想象方式，而主要指文本中显现的对特定文化对象的认知状况和认知态度。前者从中文写作的‘日本想象’和‘台湾想象’入手，考察想象重心的转移和想象形态的变化。后者探讨了日文写作在殖民地台湾新文学发展中文化想象的变异，在日文写作中的所谓‘日本想象’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它不但承载了作家关于殖民社会矛盾的思考，而且深刻地传达了殖民时代台湾人浓重的文化身份焦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被殖民者身份焦虑是由日文写作中的日本想象来完成的。相关内容参见计璧瑞，《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中文写作中》，《台湾研究集刊》（第3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09年，第81-90页；计璧瑞，《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日文写作中》，《台湾研究集刊》（第1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10年，第18-26页。

感，形成了情感和思想意识之间的有机脉络。²¹⁾

根据以上论述和特点，可以说《亚细亚的孤儿》在一定程度上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对日本殖民性所带来的种种创伤，以及对它批评的态度，也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普遍的情感体系。在《亚细亚的孤儿》中，胡太明的人生即是挣扎在动荡时代中感到强烈的痛感，被自己的人生经验中的痛感所折磨，譬如他对个人的感情问题上，一直受到某种心理压抑，他总觉得正视她是一件痛苦的事。虽然对她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感到自己和久子之间的遥远的距离，正如文中所说：

“她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显得遥远，这种无法填补的距离，使他感到异常空虚。”²²⁾

假如自己能和久子结婚，以后的生活将怎么样？自己这种低微的生活能力，怎么能供养日本女人久子所需求的高度生活享受呢？这种永无出头之日的国民学校教员，再干三十年，至多也不过当个番界附近国民学校的校长……最近日本人训导，又给他加上一句‘旧头脑’来蔑视他了。……陈首席在那样的地位还甘心干，李训导在背后常常批评他是傻瓜。不过李训导近来也因为小孩子年年增加，渐渐地软化了。

这样一想，太明所有的希望顿时都变成泡影了。²³⁾

当胡太明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身份，给他带来的却是一种无法克服的痛感，这种痛感体验等于就是殖民记忆所留下来的心理创伤。当他意识到现实与理想

21) 参见计璧瑞，《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华文文学》（第5期），汕头大学，2010年。

22) 关于这一点，陈映真认为胡太明和久子的恋爱中所感到的痛感来源于殖民体制。在胡太明意识到他热烈地爱恋着久子的同一片刻，他意识到殖民者和亡国者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单纯人种上的差别，而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强暴者和被强暴者的差别。这种‘遥远的’、‘不可填补的距离’不只为太明带来‘异常的空虚感’，还残害了太明作为一个人的信心，升起一种卑屈、自秽的情绪。他向统治者造成的‘距离’跪服。他自怨自艾，说自己的血液是污浊的，配不上久子。殖民体制的暴行之一，便是这种对亡国者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的凶恶的摧残。参见陈映真，《试评〈亚细亚的孤儿〉》。收吴浊流著，《亚细亚的孤儿》，第238-239页。

23) 吴浊流著，《亚细亚的孤儿》，第30-31页。

间的矛盾时，对于被殖民者身份的胡太明来讲，只能选择放弃，也无法防守自己变得消极。下面的一段话也代表着主人公的痛苦经历所引发的‘痛感’：

淑春的演说越来越激昂了，听众的掌声也随之热烈起来，这使太明感到莫名的难堪，他终于像遁逃似的离开了那个场所。他加紧脚步，巴不得早些离开那里，他觉得自己和淑春的婚姻，实在是建立于莫名其妙的错误上，因此深深追悔不已。

以后，社会上这种热潮依然继续发展，而且愈演愈烈。到了八月，政党的活动更加活跃起来，南京在这样的风潮中，虽然已经到了九月，但天气依然异常闷热。

太明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精神上相当苦闷，但他并不正视现实背后的事物，反而对自身作种种有利的解释，他只能在这样的解释中，求得生活的平衡；可是，危机终于由另一角度，侵袭到他这旁观者的身边来了。²⁴⁾

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感情和婚姻，加之面对时代的漩涡和紧张的局势，主人公的精神苦闷无法化解，虽然目睹着当前的现实，但他只能以旁观者的眼光和角度去面对现实。除此之外，祖父的死、分家问题、社会问题等的种种烦扰，以及制糖会社强制施行栽培甘蔗的政策，母亲被制糖会社的社员殴打等诸多事件也一样。在吴浊流的作品中表现的主人公所经历的是由个人的无奈、精神刺激，以及个体生命脆弱而敏感的痛感体验。

正如作者所说的一样，《亚细亚的孤儿》所揭露的正是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和‘渣滓’²⁵⁾，这种‘污泥’和‘渣滓’所带来的也正是个人的‘痛苦’的‘情感’，因此，我们能明确地意识到它的根本痛感与殖民压迫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吴浊流笔下的胡太明在时代潮流和人生困境中的苦苦挣扎，背后隐藏着殖民的‘痛感’记忆的因素，在文本的具体细节中，这些因素在主人公的痛苦经历中所体现出来的‘情绪’，以及痛感体

24) 同上，第136-137页。

25) 吴浊流，《回顾日剧时代的台湾文学》。收《吴浊流作品集》第六册，台北：远行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

验所产生的复杂性。胡太明一直受着日本殖民者的欺压，即从家乡到日本留学中的经历，以及海外留学归来又被乡人排挤，赴大陆亦被视为外人，最终被逼疯的胡太明的人生轨迹，充满殖民社会的‘痛感符号’。换句话说，吴浊流在文中细致描写出的殖民者的压迫性，由此引发出主人公屈辱的阴影，悲伤、忧伤和愤怒的‘痛感’，构成了复杂而纠结的‘情感’。

3. 小结

台湾所经历的殖民是多重的，日本的殖民政策所带来的大量变异的因素和现代性的冲击，使台湾人面对身份建构的危机的精神创伤，也使台湾社会形成了与其它被殖民地地区性格迥异的殖民现代性和经验，以及与众不同的情感结构。因此，殖民地台湾新文学作品即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凝结，因此有着非常显著的意义。

根据以上材料，本文解读了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寻找线索和提出了若干思考。本文以‘记忆’、‘创伤’和‘殖民经验’这三个关键词入手，论述的重点为‘殖民现代性和经验’的文化意义，将它分为“‘迷茫’与‘困惑’中的‘身份认同’之旅”和“‘人生挣扎’与‘痛感体验’中所呈现出的‘殖民现代性与经验’”，浅谈了《亚细亚的孤儿》在个人内部的挣扎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特殊的文本内涵的。

本篇文章的正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在‘迷茫’和‘困惑’的殖民语境中一名知识分子胡太明的‘身份认同’之旅。吴浊流笔下的胡太明正是代表着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吴浊流把自身的现实立场投影到胡太明的身上。通过胡太明的人物形象，本文关注了在这部小说中殖民语境下的台湾人身份问题的阐释模式。由于台湾的殖民语境的概念和形成背景比较特殊，具有明显的‘殖民’和‘被殖民’的二元性质和结构。值得指出的是，《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它既体现抗拒被民族同化的象征性，也呈现出寻找台湾人‘自

我身份认同’建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正文第二部分，首先阐述了《亚细亚的孤儿》的主人公的苦闷经历与当时日本殖民性之间的联系。小说中，胡太明的人生坎坷既代表着他个人的痛感，也代表着当时特殊时期普遍的情感体系。根据这一点，笔者认为它的根源在于殖民压迫性所产生的‘痛感’，也可以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在台湾新文学研究中，殖民时期的文学作品正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对象，这样能够克服从殖民经验中被隔断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而能够形成所谓台湾新文学固有的文学生态以及文学书写中的文化现象。吴浊流从这样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寻找‘孤儿’的原乡，也寻找‘身份认同’的途径，

《亚细亚的孤儿》无疑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和价值。由于这样的缘故，当我们阐释《亚细亚的孤儿》的内涵时，它意味着文化想象和身份建构的多元性、地方性等。从‘压抑’提升到‘身份认同’和‘情感’（这里所说的情感是指‘痛感’）表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出台湾人独特的身份意识，也体现出更深层次的民族认同感。

参考文献

[基本文献]

吴浊流著,《吴浊流作品集》,台北:远行出版社,1977年版。

吴浊流著,《亚细亚的孤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吴浊流著,《无花果》,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

[研究专著]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

陈芳明著,《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

陈芳明主编,《台湾文学的东亚思考:台湾文学艺术与东亚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建会,2007年。

陈培丰著,《“同化”の同床异梦》,台北:麦田出版,2006年。

陈昭瑛著,《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黄进兴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黄静嘉著,《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计璧瑞著,《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旷新年编,《文学史视阈的转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罗岗、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乌蒙勃托·艾柯著;卢德平译,《符号学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须文蔚主编,《文学@台湾》,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8年。

[学术论文]

计璧瑞,《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中文写作中》,《台湾研究集刊》(第3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09年。

计璧瑞,《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日文写作中》,《台湾研究集刊》(第1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10年。

计璧瑞,《文学书写中的殖民现代性表征及其文化政治寓意》,《华文文学》(第3期),汕头大学,2010年。

计璧瑞,《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华文文学》(第5期),汕头大学,2010年。

刘红林,《“孤儿意识”论——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分析》,《华文文学》(第3期),汕头大学,2005年。

刘小新,《台湾文学研究中的殖民现代性幽灵》,《东南学术》(第5期),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9年。

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第5期),北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

Abstract

A Study of ‘*Orphan of Asia*’ by Wu Zhuoliu as a representation of memory, trauma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Han Jiyeon

Wu Zhuoliu’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of *Orphan of Asia*, which is originally written in Japanese, completed in 1945, it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classic of modern Asian literature and a groundbreaking expression of the postwar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orn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raised in the scholarly traditions of ancient China by his grandfather but forced into the Japanese educational system, Hu Taiming, the protagonist of *Orphan of Asia*, ultimately finds himself estranged from all three cultures. *Orphan of Asia* offers a powerful depic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colonialism.

Taiwan has experienced Japanese colonial rule from 1895 through 1945, many factors of Japan’s colonial policy that brings its modernity to Taiwan. The Taiwanese identity crisis is regarded as a problem of mental trauma, and it also examines the structure of emotion in Colonial Taiwan.

Therefore, the text of the Wu Zhuoliu, *Orphan of Asia*, is the symbol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 from the colonial modernity and colonial experience, it is worthy of discussing to fin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novel.

Key Words : *Orphan of Asia*, Colonial Modernity, Colonial Experience, Cultural Identity, keenly feel

투 고 일 : 2014. 4. 23. / 심 사 일 : 2014. 5. 20.~ 2014.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4. 6. 20.